

胡适日记的新闻史价值

沈毅

【提要】胡适日记保留有丰富的新闻史资料，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理解胡适新闻生涯的思想基础；为认识同人报刊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助于深化报刊业务史和媒体成长环境的研究；勾勒出自由知识分子报刊依违于论政和启蒙两项使命的心路历程。日记的新闻史资料分布有些失衡，某些资料信息线索不完整。

【关键词】胡适 日记 新闻史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0) 06—0125—08

《胡适日记全编》(全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收入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总字数计380多万字，但这仅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日记中的不少报纸剪报，整理出版时做了省略处理，未附全文，仅作大致介绍。故日记的实际规模会更大些。胡适生前即出版过留学时代的日记，他去世后，台湾和大陆相继整理出版过几个版本的日记。现《胡适日记全编》应该是最完整的胡适日记。日记因其内容丰富、记事广泛而受到重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参考书。学术界已经发表有胡适日记与文学史、政治史、教育史、思想史等相关的论文，而胡适日记与新闻史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是很薄弱的。

一、名家视野中的新闻史资料集

胡适是成就斐然的学者，也是一位很有地位和影响的兼职报人，一生创办、主持或起主导作用的刊物有《竞业旬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

《现代评论》及《自由中国》等。有关他的新闻活动，日记留下了为数众多的材料。对于新闻事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重要媒体和报人的立场和态度，日记也都有详略不等的记载。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有一天梁实秋、徐志摩和罗隆基去胡宅造访，发现书架上有一摞胡适日记手稿，据梁实秋回忆，“胡先生的日记是用毛笔写的，至少我看到的这一部分是毛笔写的，他写得相当工整，他从不写行草，总是一笔一捺的规规矩矩。最令我们惊异的是，除了私人记事之外，他每天剪贴报纸，包括各种新闻在内，因此篇幅多得惊人，兼具时事资料的汇集，这是他的日记一大特色，可说是空前的。”胡适当时对梁实秋等人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①其实，日记并不仅仅用于留给孩子，胡适本人也经常翻检写过的日记，也考虑到给社会留下有价值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

^① 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刘天华、维辛选编《梁实秋怀人丛录》，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8页。

他记道：“近来翻看我的旧日记，深觉其有用”；^①“我受了日记的帮助最多，以后应继续写下去。记此自励。”^②胡适曾深深后悔他1917年从美国回来后四年间未记日记，适逢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若记了日记，中国近年思想史可添不少资料。”^③他并不满足于机械地扮演记录员的角色，日记上能读到不少他对人事的评价和判断。历史是人们对往事的研究和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适日记就是一部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新闻史。

相比之下，时下我们能看到的好几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日记，其新闻史价值都比不上胡适日记。鲁迅日记格外简单，内容多为日常事情，如出门、会客、著述、天气等。很多情况下寥寥数行，甚至三两个字：“晴。无事”、“无事”。^④客观叙述居多，评价和议论很少。许广平的看法是：“鲁迅的日记，过于简略，却从这简略中也找出不少蛛丝马迹，可资研究的。”^⑤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顾颉刚日记》部头很大，600万字。顾一生出入于学术界，日记所记基本限于治学、读书，所参与的报刊活动也仅限于学术研究范围。《蔡元培全集》共18册，其中日记3册，新闻史资料相对比较丰富。蔡元培关注中外报刊，不时记下所读文章的梗概内容，剪报也不少，有时还写下自己的评价。1937年8、9月间多有媒体抗日报道，9月一则日记认为“《大公报》社评《诫日本军阀》，甚佳。”^⑥1938年7月20日记《申报》报道钱玄同逝世，蔡日记简略介绍了钱的生平，称其自幼受兄长压制，“故对于大家庭制度反对最烈”。^⑦蔡没有亲身参与过办报，故日记对新闻业界记载很少。《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各10册，总计六百多万字。吴人生经历单一，为纯粹学者，日记甚为严谨、翔实，多为读书、授课、会友及内心感受。他主持过《学衡》杂志和《大公报》的文学副刊，日记多有反映，如1927年6月14日记办刊真实想法：“议以《学衡》专期为王静安纪念。……访陈寅恪，谈久。……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⑧也就是说，在道德理想层面上实行“中体西用”。1949年之后的日记，基本上是参

加开会、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和接受批判等内容。

二、近现代新闻史历程的多侧面记录和诠释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报刊活动是近现代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胡适等人积极参与或创办的几个报刊，可以说是此类活动的主流。

叶公超评价胡适文章的风格时说，“但是他的文字始终是坦率而纯笃的。刻薄是与适之的性格距离最远的东西。”^⑨陶希圣强调胡适文章“清楚”的特性，“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⑩胡适自己也多次说过，他不怕别人说他文章“浅”，他只求把问题讲清楚，把话说明白。日记中可找到“坦率纯笃”和“清楚”的思想渊藪。1915年2月18日胡适规划自己的留学生活：“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卫生……第二，进德：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第三，勤学……”。^⑪几个“一致”，后来成为他为人处事包括办报活动的基本准则。留学时代讲授英国文学的桑普森教授，异常认真，不敷衍，胡适深感“敬畏”，“也立誓不徇情面，不说违心的应酬话。我有时或不能完全做到这步地位，但我希望总不致十

①② 《胡适日记全编》(6)，第252、455页。

③ 《胡适日记全编》(5)，第885页。

④ 《鲁迅全集》(1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

⑤ 许广平著、周海婴主编《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⑥⑦ 《蔡元培全集》(17)，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226页。

⑧ 《吴宓日记》(3)，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4~355页。

⑨ 叶公超：《深夜怀友》，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页。

⑩ 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追忆胡适》，第119页。

⑪ 《胡适日记全编》(2)，第61页。

分对不住我这位师友。”^① 胡适的导师杜威教授，“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② 胡适办报说真心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是为自己负责，也为读者负责。当然，历史也证明胡适的“证据”往往遮挡住了他的理论目光，这恐怕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的哲学源头。

日记为理解自由主义报刊史上的一些现象提供了注脚。《努力周报》前后存续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创办之初，适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的清华大学开会，中国随即出现了一个声势不小的非宗教运动，舆论界也就此开展了沸沸扬扬的争论。但《努力周报》对此的反应并不热烈。陈独秀支持非宗教运动，他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指出基督教的历史是与侵略相联系的，同时也指出教义和教会的某些区别，即教义尚有某些积极的因素，而教会就是罪恶的同义语。^③ 蔡元培反对宗教进入学校，主张信教与不信教都享有充分的自由。^④ 实际上他也倾向于非宗教运动。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担心当局借题发挥，搞思想专制，于是发表了反对非宗教运动的声明，强调信教是思想自由的一部分。^⑤ 相形之下，《努力周报》只发表了陈衡哲的一篇文章：《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连载两期），胡适本人置身事外，没有公开发表有关言论。要解释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只能到胡适日记中去找答案——这与胡适对基督教态度的演变有关。胡适 1911 年 6 月 18 日写到：“自今日为始，余为耶稣信徒矣。是夜 Mr. Mercer 演说其一身所历，甚动人，余为堕泪。听众亦皆堕泪。会终有七人起立自愿为耶稣信徒，其一人即我也。”^⑥ 对传教行为，最初胡适也抱着容忍的态度，1914 年 8 月日记所写，“年来颇觉传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他们觉得自己所信是真实的，又想把自己所信告诉别人，“其用心良可敬也”。^⑦ 1915 年 3 月胡适在美国教堂演讲，称赞传教士的价值在于“总是带着一种观念，一种批判精神”，其情形好比留学生敏锐发现故国种种弊端，而久居其国反倒习以为常，“漠然处之”。^⑧ 但胡适后来放弃了信徒的身份，也反感传教者的说教，1911 年 6 月 18 日的

日记附有他 1919 年 10 月 10 日的“追记”，称自己变成信徒一事，“后竟不成事实”，原因在于不能容忍神甫用“感情”手段“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⑨ 他对礼节性参与教会活动也保持着警惕和距离，1922 年 4 月 7 日记：“有些基督教徒真可恶！今天的 Edwards [爱德华兹] 来说，下星期二穆德在青年会演说，他们要请我去做主席。……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 Edwards：……‘我想您是知道我对于基督教组织的态度的。两年前，在那次卧佛寺会议上，我就当着在场的许多基督徒的面，宣称过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从来无法接受基督教的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观念。我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反对一切宗教劝诱行为。因此，特来信请您原谅：我不能主持星期二的会议。我知道，您作为一名好的基督徒，把坦诚看得比礼貌更珍贵，故而，我开诚布公。我确信您会谅解的’。”^⑩ 就在北京关于基督教辩论正酣之际，胡适参加了一个外国人的家庭宴会，宾主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宗教，胡适表达的意思是：不必到历史里去寻求事例来攻击宗教或替宗教辩护，“因为没有一个大宗教在历史上不曾立过大功、犯过大罪的”；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是有关联的两个概念，不应混为一谈：“宗教是一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的态度最好。”^⑪ 信奉思想自由的胡适，对于传教劝诱，保持中立态度，在《努力周报》上刊登一篇陈衡哲的基督教演变的背景性文章给争辩的双方看。《努力周报》在激烈的辩论中冷清登场，不足为怪。

从胡适的日记可以看出，他走上学者兼报人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在特定时期创办刊物也不是心血来潮，日记可追溯他思想的足迹。

①②⑩⑪ 《胡适日记全编》（3），第 269、368、610~611、707 页。

③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0~431 页。

④ 《蔡元培全集》（4），第 591~492 页。

⑤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11 页。

⑥⑦⑨ 《胡适日记全编》（1），第 106、412、110 页。

⑧ 《胡适日记全编》（2），第 107 页。

胡适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担任过《竞业旬刊》的主笔，这奠定了他留学美国时继续关注报界的基础。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2年11月，针对英、美许多报纸反对中国的言论，他在中国留美学生会议上“建议举一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消除党见之争，利弊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①他认为美国报纸版面扩张过快，批评《纽约时报》新闻栏目的繁琐倾向：“其实此亦无谓之繁冗，徒费读者目力心力耳。若此十万字之新闻，有人为之删繁芟复，则不须一万字已足达意而有覆盖矣。”^②他记下美国《世纪》杂志编辑吉尔德（Richard Watson Gilder）的办报风格：阅读外来投稿时最留心人才；当好编辑一要有思想，二要有良心，三要有品位。^③看来吉尔德影响了胡适的办报实践。胡适办《新月》时曾同闻一多有过一次议论深刻的谈话，他写到，“我同一多从不曾深谈过，今天是第一次和他深谈，深爱其人。”^④1933年11月胡适在《国闻周报》上读到张佛泉的《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非常高兴，“其言甚有理”，“当物色其人”。^⑤此后《独立评论》不止一次地登载张佛泉的论文。《独立评论》宣传抗战，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所以办得成功，与胡适有意识的知识积累分不开。1915年1月记：“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且吾以舆论家自任者也，在今日为记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风俗国力人心。”胡适下决心熟悉日本文字语言，甚至要“以能以日本文著书演说为期”。^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时在美国的胡适托人购买日文语法书。^⑦胡适能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任驻美国大使，也与他办《独立评论》分不开，如1947年12月日记所说的，主编了五年《独立评论》，确是他出使美国的“好训练”。^⑧

胡适日记为同人报刊活动，包括同人报刊兴废演变、同人之间关系、同人报刊传播效果等，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线索。《努力周报》1923年10月停办后，胡适等人曾一直酝酿复刊。1925年1月17日，胡适与《现代评论》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陈源相遇，“同步行回到我家中，谈甚久。他说，他们盼望我们不办《努

力周报》，而把《太平洋》归我来办。前者我本已与一涵说过，后者我也赞成。”^⑨看来，《努力周报》的最终停刊，除了担心与《现代评论》竞争外，还有《太平洋》的因素。但《太平洋》的情况迄今人们关注不多，似乎后来胡适等人也并没有接办，其中原委还有待于史料进一步发掘。同人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集资办刊，有固定的主编，但有时也轮流编辑，稿件的观点不尽求一致。主编负责组稿，同人义务撰稿，但若出现稿荒，主编就要责无旁贷地赶写稿子。《独立评论》时期胡适为此没少挨累，日记上相关记载很多。同人之间的关系简单、松散，也很真诚。傅斯年曾因误解了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关于日本侵华的文章而愠气，甚至想退出同人队伍。但听了胡适的解释后，又回心转意。^⑩同人的思想认识也不尽一致，丁文江执着于论政，曾对人们讲不要迷信胡适说的文化建设。傅斯年算作自由知识分子中较为激情澎湃的一位，力主《独立评论》时评更有锋芒。蒋廷黻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不是民主，而是强有力的政治独裁，胡适则认为民主下的弊病只能通过更民主的方式去克服。日记对此有直接、间接和详略不一的反映。傅斯年也一度盼望中国出现政治强人，胡适日记：1926年出访欧洲，与在巴黎学习的傅斯年“论政治”，“他总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有能力的独裁者，以整饬社会秩序，再造文明。我说，此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有何区别？况独裁者如墨索里尼之流，势不能不靠流氓与暴民作事，亦正非吾辈所能堪。德国可学，美国可学，他们的基础皆靠知识与学问。此途虽迂缓，然实唯一之大路也。”^⑪同人的政治立场相左而分道扬镳后，个人的友谊往往能较好保持。李大钊和胡适曾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同人，后来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论

① 《胡适日记全编》（1），第185页。

②③⑥⑦⑨ 《胡适日记全编》（2），第155、508~509、28~29、122、202页。

④⑤⑩ 《胡适日记全编》（6），第43、249、216页。

⑧ 《胡适日记全编》（7），第691页。

⑪ 《胡适日记全编》（4），第339页。

战，但事后两人仍有很多交往。李大钊联名胡适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请胡适在《努力周报》上策应孙中山的主张；^①宴请苏俄驻华代表时，胡适、蔡元培等作陪。胡适曾邀李大钊到自己家里分析时局。1934年1月胡适陪客人到北京西山，路过万安公墓时，特意去凭吊李大钊墓。发现没有墓碑时，他提醒自己“当嘱梦麟（蒋梦麟，时任北大校长一引者）补立一碑”。^②同人报刊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努力周报》刺痛了军阀，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写信给胡适，指责《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一文“断章摘论过于武断”。^③日本人很反感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撰写的谴责日本侵华的时评，以至于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抗日救亡，日本高桥武官跑到北平市政府抗议，“说今天学生游行，是有背景的，主谋的人是蒋梦麟与胡适。”^④（“一二九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估计高桥武官当时或不知，或有意给胡适“抹红”。待考。）次年胡适的另一篇有关时评竟惹得天津的一家汉奸报纸嚷着“驱逐胡适出华北”。^⑤在台湾，由雷震主持、以胡适为精神支柱的《自由中国》杂志因鼓吹民主、反对独裁而被蒋介石封杀，雷震被军事法庭审判。1960年11月18日日记详细记下了胡与蒋就《自由中国》和雷震案的谈话。胡告诉蒋，国际社会对雷震一案普遍不满，他本人在国际上几乎没脸见人。蒋介石进行辩解，并抱怨胡适近两年只相信雷震而不相信“政府”。^⑥没有胡适的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或许永远不为世人所知。

对近代报刊业务史的发展演变，日记留下了有意义的资料和日记主人的一家之言。《努力周报》上的“这一周”综述栏目是胡适的一个创造。在《胡适文存二集·序》中他说：“《这一周》的短评，本无保存的价值。因为有朋友说，这种体裁在今日或以后的舆论界也许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暂时留在这里。”^⑦1922年6月记：“在家作‘社论’，拟创设‘短评’一体，但很不容易做。”^⑧日记有不少对报刊的评价，为人们审视新闻史提供了参照系。1921年10月3日胡适为上海的《时报》写了一篇《十七年的回顾》的纪念文章，当天日记也谈到《时报》

对于少年胡适的影响。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在介绍《时报》时，就引述了胡适的纪念文章。^⑨《努力周报》酝酿复刊时，志在继承《时务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的传统，在胡适看来，这三本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⑩日记中还有胡适对古代新闻史资料的摘录和评价，1933年12月18日胡适读史，在日记中抄录了南宋孝宗时周麟之的《论禁小报》奏章，认为“此奏可算是中国报纸的最早文献”。^⑪胡适是专指私人报纸出现时间而言的，和我们今天通行的官报始于唐代的看法并不矛盾。日记对媒体与受众关系也有记述。胡适剪贴的关于他自己的文章《宣统与胡适》，近距离扫描了躲在故宫的溥仪的阅读生活：“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儿上摆着本日的报纸十几种，内中有《晨报》和《英文快报》，炕儿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⑫日记还透露出当年媒体“造势”和“挖人”的一些信息。1921年胡适受邀到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上海报界借此由头，尽情炒作，冀以开拓销路，扩展自身影响。《商报》刊出《胡老板登台记》，对商务印书馆迎接之事极尽渲染，说胡适主持编译所月薪五千元，“比大总统还舒服”；全馆张灯结彩，油漆一新，“另辟一精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胡适啼笑皆非：“种种待遇，几乎没有一句是真的！”^⑬《时报》希望借胡适的名气和能力提升影响，胡适写道：“《时报》馆狄楚青托人写信来说，要我‘担任撰述，月奉纂敬二百元，不拘体裁，不拘字数’。……卖文本不妨，但此事须

①③⑧⑫ 《胡适日记全编》（3），第695、767、692、736、383、385页。

②④⑪ 《胡适日记全编》（6），第275、542、253页。

⑤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4页。

⑥ 《胡适日记全编》（8），第724~726页。

⑦ 《胡适文集》（3），第1页。

⑧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7页。

⑩ 《胡适日记全编》（4），第188~189页。

细查。”^①最终胡适同意了，“我颇思考了几日，因近来颇不满意于《时事新报》，故答应了他。”^②到了1923年《时报》竟想请胡适干专职的，胡适写道，9月陈景韩来，“说狄楚青和他都想请我去主办《时报》，希望把《时报》变成一个全新的报纸。我婉辞谢却了。”^③

日记有助于了解新闻媒体成长环境的变迁。北洋军阀时期，报人没有安全保障可言，但一定条件下又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每周评论》被取缔后，胡适一直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④1922年决定创办《努力周报》，初次递交申请，竟遭警察厅拒绝。胡适不气馁，“再请立案，措辞颇严厉”，^⑤终于获准。国民党对舆论控制的程度无疑超过了北洋政府，如1928年胡适感叹的，“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⑥“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⑦持这种看法的当然不仅是胡适，著名报人胡政之在20世纪30年代说得明白，“要讲压迫言论，从我二十年的经验看来，真是一个时代比一个时代进步。……民国十七年革命军统一北方，党部成立，言论便渐渐不如军阀时代，因为党人们都从此道出来，一切玩笔杆，掉花枪的做法，他们全知道，甚至各处收发的新闻电报检查之外，还任意加以修改，这比从前的方法，何止进步百倍？”^⑧1928年4月日记的一则《上海画报》剪报，活灵活现刻画了新闻报道被扭曲的状况。剪报说，“有闻必录”是新闻学的一种主张，但中国自新式报纸出现后此主张竟演变得面目全非：1. “有闻必录”。以“有闻必录”作为报道失实和毁谤名誉的借口来搪塞批评。2. “无闻必录”。热衷编造假新闻糊弄读者。3. “有闻不录”。尽管采访的技术手段改进了，但当局限制也越来越多，“有服从当局的检查而不许刊载的，有经各方面的特殊要求而不能刊载的，也有为了环境关系，自然而不敢刊载的。”4. “不闻有录”。“报纸受限制到了极点”，“看报等于不看。除了大家所知道的事情而外，其余较为重要较为秘密的消息，报纸上只字不提。”^⑨胡适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压制言论，结果遭致一连串

的围剿。《民国日报》上陈德微的一篇《匕首·浅识》称，“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反革命和反法，均当治罪。有人疑我为梁山泊里的朋友吗？我却要说他是沉湎于洋八股之中的外国宋儒！”^⑩日记里的一份剪报批评胡适看不透“美洲的民主政治这样的虚伪”，“在现在的时候国民党并不是不尊重民权，我们所说的民权，是要全体民众利益为前提，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前提。”^⑪胡适批注：“这样不通的文章，也要登在党报上丢丑！”^⑫报界为自保往往对国民党上层非主流的声音选择沉默。1929年3月11日汪精卫、何香凝等人发表声明，反对以指定和圈定办法产生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认为“必须扶助民众行使政权。惟建立民权，然后可以建立廉洁而有效能之政府”。^⑬胡适批注：“这宣言，上海各报都不敢登，只有《江南晚报》与《东方晚报》登出。”^⑭即使报界自身争取新闻自由，媒体报道起来也格外谨慎小心。1929年7月苏州全市11家报纸为抗议新闻检查而全体停刊，《申报》虽作了报道，但过于简略，显然是因为胆怯而压低了调门。胡适讥讽道：“这是很重大的事，而《申报》给他这么大的地位”，“我为上海的报纸惭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诸人定不觉得！”^⑮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政府控制抗日言论最为严厉，只有极少数报刊有胆量仗义执言，却也岌岌可危。《大公报》1935年12月被华北当局勒令停止“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⑯地方当局同样也容不得批评，《独立评论》1936年11月因发表张熙若的文章而开罪了宋哲元，被禁出版达四个月之久。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甚至听说“宋哲元拟拿办胡适之、张熙若”。^⑰胡适不得已给宋写信道歉，

①②④⑤ 《胡适日记全编》(3)，第397、408、552、544页。

③ 《胡适日记全编》(4)，第57页。

⑥⑦⑨⑩⑪⑫⑬⑭⑮ 《胡适日记全编》(5)，第110、403、394、435、505、507、367、365、450、461页。

⑧ 王瑾、胡政之编《胡政之文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6~1047页。

⑯ 《胡适日记全编》(6)，第537页。

⑰ 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5页。

并由北平市长秦德纯安排面见宋哲元。^①

胡适曾说过，“我民国六年回国，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政治，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政治性杂志。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想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治。”^②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这种现象值得研究。原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做一番踏踏实实的事业，给中国补上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一课。但他们在社会现实面前，又不得不进行调整，显得举棋不定，依违于论政与启蒙两大使命之间。《努力周报》论政之际也没忘了文学作品和考证《红楼梦》。停办后又拟议复刊的新《努力》最终没能问世，也与定位迟迟不决有关，也就是说是继续办论政的周报，还是改办谈思想和文学的月刊，同人们一直意见难以统一。学术型的《新月》办起来之后，同人们又张罗办论政的《平论》周刊。《平论》的发刊词是胡适撰写的，批评在“训政”幌子下，“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③最初选罗隆基当主编，但后来又推胡适来担任，而胡适感到“此事大不易，人才太少；我虽做了发刊辞，心却不很热”，^④“终于有些狐疑”，对“国家大问题”，“那班党国要人固然没工夫想，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的工夫罢？”^⑤《平论》最后还是未能出版。《平论》办不起来，论政却如鲠在喉，原本定位于启蒙的《新月》只好同时又肩负起论政的担子。1932年创办了《独立评论》，同人们又想着启蒙的事，日记写道：1934年2月的一天，聚会时“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承继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⑥但这个刊物最终也没能问世。

三、详略失衡、线索不清和补记等问题

日记的新闻史资料分布有些不平衡。因为一些特殊的缘故，有的时期胡适日记的新闻史资料很少，甚至几乎没有。1949年的日记全年剪报不超过10篇，内容多与胡适个人有直接关系：陕北广播称，自公布战犯名单后，很多群众认为有遗漏，要求把胡适、于斌等战争鼓吹者补入；^⑦香港《大公报》说，以往北京大学因为国民党法西斯作风、媚美陋习及“胡适、陈雪屏等的放散毒素”，“充满了反动的气氛”，而解放后的北京大学“蓬勃热烈”、“走上健康合理的道路”。^⑧

日记中有些资料的线索不够清楚。剪报有的标注了出处（报名）和日期，但很多并没有标注。这就给人们把握资料和分析问题带来一定的难度，也无助于由此及彼寻求新的资料。胡适1948年自责日记过于简略，“这两天，我常谈：日记必须较详细，否则没有多大用处。过略的日记，往往别人不能懂，有时候自己也看不懂。我引我的《留学日记》卷一，P. 6，‘无忘 Wilson [威尔逊] 讲演’一条做例。此条若无详注，无人能懂。”^⑨可惜到了1949年，日记又屡屡犯下类似错误，很多时候每天仅几行字，甚或几个字：3月18日“7：00家中”；3月25日“12：30林先生（板桥）”；5月11日“Washington [华盛顿]。”大概当时胡适心绪烦乱，已没心思详写日记了。

日记还有少量内容不是当日所记，而是日后补记的，如1921年6月21日“补作昨日日记”，^⑩7月16日“补记了几日记，始睡”。^⑪补记当然是记日记的一种必要手段，谁都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有充分时间记下当日事，或不遗忘任何该记之事。但若间隔过久，不仅事实记

①⑥ 《胡适日记全编》(6)，第670、324页。

②⑦⑧⑨ 《胡适日记全编》(7)，第679、738、775~776、697页。

③ 《胡适文集》(11)，第143~144页。

④⑤ 《胡适日记全编》(5)，第374、377页。

⑩⑪ 《胡适日记全编》(3)，第327、375页。

忆容易模糊，而且主观判断也容易掺杂事后的因素，补记就带有回忆录性质。这会影响到日记作为史料的准确性。想必一向强调证据的胡适在补记时应该会考虑如何避免失实。

胡适日记的新闻史价值当然不限于上述，日记中还保留有许多珍贵的图片，有的源于报刊新闻照片，有的为同人当年合影，形象化的

资料在新闻史上自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本文作者：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院长、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On the Journalism History Value of Hu Shi's Dairy

Shen Yi

Abstract: Conserving abundant journalism history information, the main value of Hu Shi's dairy lies in the follow aspects: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Hu Shi's ideological foundation in his journalism career; providing important clues to the knowledge of colleagues press;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f the press business history and media growing environment; reflecting the mental process of liberty intellectual press which hesitated between the two missions of politics comment and civil enlightenment. However, in his dairy, distribution of journalism history materials is unbalanced, and information clues of some certain materials are incomplete.

Key words: Hu Shi; dairy; journalism history; value

观点选萃

试论托尔斯泰的教育情愫

袁传明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袁传明认为：以文学家头衔冠名的列夫·托尔斯泰，还是一位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的教育家，其一生与教育结下了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托尔斯泰的教育情愫，主要表现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方面。在实践上，托尔斯泰曾三次办学，中途还到国外寻求教育良方，创办教育杂志，编写识字课本；在理论上，批判欧洲和德国棍棒加纪律的传统教育，宣传自由教育思想，创新各科教学法，论述教育学科的建设。毋庸讳言，托尔斯泰在教育学说上的贡献是卓越的而且是独特的，足以载入史册，流传后世。

在谈到教育学的任务时，托尔斯泰详细地阐明了教育学基本概念的内容。他企图从分析这些概念的内容中得出一种宏观的结论，以证明教育过程中不能采用强制手段。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包括：教育、教学、教养、学习。教育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化，目的是强使受教育者有一定的道德习惯；教学是一个人把知识传授给另一个人；学习含有教学意味，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目的是强使学生掌握一定程度的有形的习惯。同时，托尔斯泰指出了教育和教养的区别：“教育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予强制的感化，它的目的是造就一个我们所认为好的人；教养则是人们的自由关系，它所根据的就是一个需要获得知识，而另一个需要把他已获得的知识传授出来……教育与教养的区别仅在于强制，教育认为自身后面有这种强制之权。教育是一种强迫的教养。教养是自由的。”

(马光 摘编)